

中原工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乡村建设道路

探索研究

陈锦晓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中原工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乡村建设道路探索研究

陈锦晓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 郑州 ·

内 容 提 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而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也是世所罕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改良运动,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土地改革到土地承包,从农村合作化到农村现代化,从注重经济建设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无不是围绕着解决乡村问题而进行的,乡村建设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独立与富强的奋斗史。本书首先纵向回顾了我国乡村建设的历史,然后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对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与展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村建设道路探索研究/陈锦晓著.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0734-649-4

I. 中… II. 陈… III. 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国 IV. 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8741号

出版社:黄河水利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黄委会综合楼14层 邮政编码:450003

发行单位:黄河水利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371-66026940、66020550、66022620(传真)

E-mail: hhsclbs@126.com

承印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印刷厂

开本: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9.125

字数:230千字

印数:1—3 000

版次:2009年6月第1版

印次: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前 言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名作《乡土中国》中开宗明义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解决了农民问题，谁就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核心。

乡村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名词，根据社会学家乔启明和蔡宏进的解释，“乡村”是指以行政区划的乡镇所辖的地域实体，它的外延是以乡（镇）政府所在的圩镇为中心，包括其所管辖的所有村庄的地域范围。

国内外对乡村概念的理解和划分标准不尽相同，一般认为乡村的人口密度低，聚居规模较小，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相对较简单、类同，居民生活方式及景观上与城市有明显差别等。

但乡村不论从地理范围还是历史演变看，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乡村是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因此，乡村建设的内容也应该是不断扩展的。本书采用“乡村”而不用“农村”这一概念，意在表明当今的乡村建设并不是单一的建设，不是一般的村庄建设或产业建设，它是一种复合型的建设，应该包括生产建设、制度建设、人文建设、精神建设等多个层面，而且，乡村应该有其自身的特点，简单照搬城市发展道路，把乡村

建得像城市，不是乡村建设的初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发展的最高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生活的最佳所在，乡村拥有天然的景观，乡村应该是一个休闲的地方，生活悠然自在，久居闹市的人们可以在那里获得心灵的宁静与修养。

中国的乡村建设并不是在事先规划好的图纸上进行的，它是在内外交困的双重压力下展开的，因此，就充满了波折甚至是血与火的洗礼。中国的乡村建设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中国独立与富强的奋斗史。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在西方工业化的冲击下，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经济面临深渊。农村面临破产，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认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种由社会团体或政府机关或教育机关发起成立的乡村建设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兴起，虽然它们的建设主张各不相同，但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则是这些团体和机构的共同点。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和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相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其实，如果撇开乡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之别，仅从试图通过解决农村问题达到民族再造、国家振兴的目的，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其实也可以算做是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当年先哲们试图达到的目标后人仍在追求中，时至今日，还有学者效仿当年的做法开展新乡村建设运

动，试图为当代的“三农”问题求解。可以说，我们依然走在探索乡村建设的道路上。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依托农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时期，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把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土地从分到合再到分，分分合合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探索适合国情的农村发展道路，土地在减少，人口在增加，但千百年来历代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但愿苍生得温饱”的愿望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得以实现。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最终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三部曲，也是乡村发展的三部曲，今天的乡村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正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征途中。

也许，“三农”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只不过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的“三农”问题更加复杂，解决起来难度也更大。正因为如此，“三农”成为从民间到官方、从政界到学界所共同关注的话题，观点之多、方案之杂可能是任何一个话题都难以企及的。解决“三农”是一个综合工程，无论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协调发展；解决“三农”也是个长期的工程，需要国人长期而艰苦的奋斗，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解决“三农”的过程，也是对全民进行一场国情教育的过程，国外的经验再好，也必须适合中国国情。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各种方案终归是要落到实处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广大农村探索出了一系列建设模式，既有举世瞩目的“天下第一村”，也有默默探索的“五山模式”、“南平机制”，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在实践中走出的建设道路，无论显赫与否都让人肃然起敬。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农村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模仿，而且还要面临牵一发而动全身、摁下葫芦起来瓢的无奈和困惑，历史和国情注定了我们要边走边总结，边走边探索。

进入 21 世纪，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以及接二连三的惠农政策的出台，使我们对未来的乡村建设充满期待。

作者

2009 年 3 月

目 录

前 言

- 第一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 (1)
- 第一节 乡村建设运动 (1)
- 第二节 乡村工业化道路 (20)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与实践 (28)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新变化 (43)
- 第一节 土地改革 (43)
-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 (49)
- 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63)
- 第四节 农业现代化 (71)
- 第三章 改革时代 (87)
- 第一节 党对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 (87)
- 第二节 农村改革 (97)
- 第三节 乡村工业化道路再探索 (111)
- 第四章 “三农”问题 (132)
- 第一节 农业问题 (132)
- 第二节 农民问题 (143)
- 第三节 农村问题 (153)
- 第四节 “三农”问题原因分析 (166)
- 第五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77)
- 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和理论支撑 (178)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89)
第三节 破解难题	(196)
第四节 国内外新村建设及启发	(215)
第六章 农村发展道路与模式的选择	(230)
第一节 农业现代化	(230)
第二节 农村工业化	(246)
第三节 农村城市化	(258)
后 记	(283)

第一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乡村建设运动

第一节 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建设的概念

中国重视乡村的理念由来已久。最早研究民国乡村运动史的陈序经在《乡村建设运动史略》(1949)一文中写道:“国人重视乡村的观念,本来很早,老子说,‘修之与乡,其德乃长’;孔子说‘吾观于乡,而王道易易’……至于孟子所谓‘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可以说是孔子、老子的理想乡村的注脚。此后,王阳明、吕新吾对于乡治不但重视,而且有具体的计划,并努力实行。”

乡村建设运动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去认识,狭义上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时期在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断,农村经济凋敝面临破产的背景下,由社会组织或教育界或政府参与发起的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如果从广义上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对农村问题的探索也应归属其中。因为两者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甚至视野可以再放远一些,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无不是围绕如何实现农村现代化展开的,从这个意

义上看，同样属于乡村建设的范畴。

“乡村建设”这一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叫法，如村治、乡治、乡村教育等，皆具有乡村建设的含义。最早使用“乡村建设”这一词的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梁耀祖（字仲华）的解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所以用“乡村建设”一词，是由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仁认为，当时乡村遭到持续破坏，而全国80%以上的人口住在乡村，因此要解决中国问题就要从最大多数人口居住的乡村入手。所以，“不谈建设而已，欲谈建设，必须注重乡村建设”。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的开篇中也介绍到“乡村建设”的由来，他说：“‘乡村建设’四个大字，以前从来没有见人用过，也没有听人说过，这是从民国二十年本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时才标出来的。以前虽也有人做过类似这样的事，但没有明白标出‘乡村建设’这个名词。自从本院标出之后，国内乡村建设的风气亦日渐开展，‘乡村建设’一词，才不断为大家所引用。”诚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一词使用后，即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采用。如1933~1935年连续三年召开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年会所出版的会议专集，其书名就叫做《乡村建设实验》，1933年各地一些从事“乡村工作先进分子”组织的联络机构，其名称叫做“乡村建设学会”。梁漱溟本人也在1931年正式使用“乡村建设”这一提法后创办了《乡村建设》旬刊。

关于什么是“乡村建设”，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论述。在乡村建设理论方面，梁漱溟的陈述最多，其代表作是《乡村建设大意》和《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由来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的意义是“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

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乡村建设，事项虽多，但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乡村建设内容分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组织建设三项，其次序为“先讲乡村组织，次讲政治问题，又次讲经济建设，末后讲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总之，“‘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这便叫做‘乡村建设’”，“乡村建设顶要紧的有两点，就是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江恒源认为，乡村建设是就一个农村或数个农村，划成一个适当的区域，依照理想的能实现的预定计划，用最完善、最经济的方法和技术以化导训练本区以内的一切农民，使全区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由自给自立以达于自治，像完成农村的整个建设。其设施有“三大纲”：一为文化的，即全区普及教育、改良风化以及清洁卫生、健全体魄之事属之；二为经济的，即全区改善生计之事属之；三为政治的，即全区团体组织、公共治安、公共建设之事属之。其目的是“教、富、政三端”，教所以救其愚，富所以救其穷，政则化其私，医其散，不私不散乃可结合团体，从事农村整个建设。晏阳初则认为，乡村建设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建设，并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其内容包括文化、教育、农业、经济、自卫等各方面的工作。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合起来便是整个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独立评论》派代表陈序经也认为：“所谓乡村建设工作，大概来说，可分为四方面：一为教育，一为卫生，一为政治，一为农业。”可见，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乡村建设应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事业已经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二、乡村建设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被誉为“用脚做学问”的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说：“为什么中国人要搞乡村建设运动，而且为什么在大陆搞？就是因为它不过是个超大型的农民国家，而不是地大物博。‘地大’

不假，‘物’不‘博’，只有百分之二十几的耕地面积。跟我们国土规模差不多的国家，像美国、巴西，它们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非常大，而农民人口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无论谈美国经验、巴西经验，任何国家的经验中国都不适用，因为它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当年发生乡村建设运动的宏观前提是：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不能参与世界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第二，恰恰是那个十年——民国史叫‘黄金经建十年’——工业飞速发展，经济急剧增长；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国大陆自追求现代化以来的第一次乡村建设运动。”

作为当事人，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介绍了乡村建设运动的背景，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起于救济乡村运动。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由于天灾人祸，农村经济日趋崩溃，救济农村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好多乡村运动都是由此而来的。梁漱溟所说的乡村衰败包括政治层面的，如兵祸匪乱、苛捐杂税、外敌入侵等；经济层面的，如外国经济侵略、洋行买办的推波助澜等；文化层面的，如礼俗、制度等的破坏。中国近百年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第二，起于乡村自救运动。梁漱溟认为，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因素，有国内因素，但细算起来，皆由人事未尽，责在政府。中国乡村破坏完全在政治。所以，乡村自救运动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梁漱溟分析了中国未能如日本一样走近代工商业道路的原因，认为中国建设必须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道路，即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

第四，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梁漱溟认为，今日中

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今日中国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或某一方面所得单独解决。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個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从梁漱溟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从经济因素看，民国初年“中国农村的衰落，已经达到很深的程度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经济的好坏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封建统治的掠夺及天灾人祸的打击，中国农村经济急剧衰落，主要表现为：一是土地高度集中，地权分配不均。中国自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因素虽然有了一些发展，但在广大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各类军阀、官吏及地主倚仗军事、政治、经济特权大肆地侵占公地或霸占民田。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地权分配越来越不均。土地高度集中的直接后果就是全国贫雇农户上升的趋势非常普遍。据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显示，1928 ~ 1933 年间，陕西渭南的贫雇农户数由 55.9% 上升为 62.7%，凤翔的贫雇农户由 79.9% 上升为 87.3%，绥德的贫雇农户由 74.3% 上升为 79.8%，在土地越来越集中和地权分配不均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是，即使是拥有土地的农民，也是勉强维持生计，他们必须面对当时农村经济衰落中的农产萎缩问题。二是农民生产力下降。生产工具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要标志。对于中国传统农业，耕畜和农具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中国农民所拥有的耕畜却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从陈翰笙、冯和法的研究中可见一斑。陕西部县从 1923 年到 1933 年的 10 年间，无耕畜户由占农家总户

数 28.85% 上升到 47.25%，湖北应城县清水湖村全村无耕牛户在 1923 年为 8%，1928 年增至 35%，到 1933 年，大半农户都没有了耕牛。其他地方情况也差不多。三是农民贫困化加重，离村率增高。农民贫困化主要体现在入不敷出、借债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恶化上。全国土地委员会 1932 年间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欠债户占调查总农户数的 47.18%，每户平均欠债额为 100 元以上。

从政治因素看，一是国内分裂，兵连祸结，政府既无法应付国际环境，也无法防救天灾。用梁漱溟的话来说，是“政治的没有”。二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也制定和推行了“复兴农村”的计划，意在通过改良阻止农村土地革命。

从文化因素看，一是中国历来有重农的传统，通过拯救农村、农业来拯救国家也是传统思维的自然延伸；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历经器物层面的学习、制度层面的学习到文化层面的学习，当中国知识分子感慨中国事事不如人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西方人对自己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的批判，又惊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迫使他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所谓“礼失求诸野”，乡村建设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利用，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三、代表流派及其思想

20 世纪初，米迪刚、王鸿一等即开始提倡“村治”，1904 年，米迪刚家族就在河北定县办起了一个模范村。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

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国统区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山东、河北、江苏、广东等地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实验。乡村建设的实质，是一种起于民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改良运动。这是一种采用非激进的、和平手段的乡村社会改良运动，是一种试图促成“建设性的社会构造——即建设新礼俗的运动”。当时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有数百个，实验区、实验点达千余个，遍及全国19个省市的几十个县和成千上万个村。有官办的，有民办的，有学术机关办的，也有政治机关办的。有的侧重于农村教育、平民教育；有的侧重于社会服务、救济灾民；有的侧重于乡村自治。其中影响大的有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高阳的江苏省教育学院、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官办的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大学、南开大学五大学联合创办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这些乡村建设团体从1933年至1935年间联合召开三次全国乡村建设协进会议，讨论的主题有“农民负担”、“乡村卫生”、“经济建设”、“合作事业”、“乡村教育”及“人才训练”等问题。在乡村建设的热潮中，最为著名的是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菏泽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定县实验”。梁漱溟、晏阳初的实践活动，代表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的最高成就，反映着当时中国的平民知识分子对“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一）梁漱溟在邹平、菏泽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菏泽和济宁的实验，被称为邹平模式或孔家店模式，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

梁漱溟（1893～1988），名焕鼎，字寿铭，早年笔名为寿民、瘦民，祖居广西桂林，后移居北京，蒙古族。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由于他以宋明理

学作为学问根底，并倡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开拓人类新文化生命的基础，注重弘扬儒家学说乃至重建新儒家学说，故海内外学者奉之为“现代新儒家”。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官僚的士大夫家庭。13岁入北京顺天中学堂。所学科目除国文外还有英文及数理化。在中学求学时期，追求维新派，思考社会改造与人生问题。18岁，时值辛亥革命爆发，遂放弃升学，到《国民报》当记者。此年加入京津同盟会组织，后热心于“社会主义”。23岁时发表《究元决疑论》，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赏识，决定聘请他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但因他任职司法部秘书无法分身。次年入北大任教，至1924年，共7年。26岁开始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次年在北大出版《唯识述义》（第一册）。31岁时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试办曹州第六中学高中部。尔后投入国民革命，转而立志于乡村教育运动。1930年在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在河南村治学院因蒋、冯中原大战而停办后，他转入山东，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1932年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该书是他在社会改革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迨至抗日战争爆发，他一直在山东邹平与菏泽县搞乡村建设实验。1937年发表《乡村建设理论》（亦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梁漱溟作为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70年他开始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1984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1985年，开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以92岁高龄在“中国文化讲习班”作“中国传统文化”报告。1988年因病逝世，享年95岁。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